

有些同志进一步指出：越是技术复杂，越容易迷信技

有些同志从道理上承认了单纯强调落实业务不对，但又提出了一个所谓现实的问题。他们说，今年第一季度主要

经过这场辩论，同志们一致认识到，产生单纯强调政治必须落实业务的错误观点，最根本的原因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今后必须更好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在自己的思想革命化上狠下功夫。领导干部思想上要有坚强的阶级斗争观念，行动上要坚定不移地突出政治，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人的思想革命化。一定要齐心协力，毫不动摇地把人的思想革命化的落实抓出成绩来。

（原载五月十七日《解放军报》）

(原载五月十七日《解放军报》)

斗争。突出政治，就是要突出毛泽东思想革命化。就是要搞阶级斗争，就是要搞人的思想革命化。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这样尖锐、复杂、激烈，很抓抓不完的斗争，不抓抓人的思想革命化，单纯强调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就必然会引导下去，不是为修正主义思想泛滥、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路，就是为帝国主义效劳。

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如果一方面讲政治，政治要通过业务另一方面又强调没有业务的政治，政治要通过业务来实现，这就不恰当地否定了政治的统帅作用，把政治摆在了从属的地位。其结论必然是：业务不好，政治就不算好，业务好了，才算政治好。这不正是毛主席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批判过的“军事好，政治自然就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这种谬论的翻版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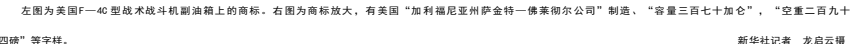
突出政治究竟要落实到哪里？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必须彻底弄清清楚。不然，这就不可能真正把政治突出起来，就不可能正确地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建军路线，就有使我军建设走上邪路的危险。希望大家展开讨论。

对于美帝国主义这种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计划，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在谈话中已经严正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早有准备的。美帝国主义欠下中国人民是算数的，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来，就没有界限。美国侵略者就逃脱不了它被彻底、

的血债是一定要偿还的”。中国人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美帝国主义胆敢把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中国人民一定奉陪到底。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侵略者就逃脱不了它被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的命运。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

杨 正福 (新华社稿 传真照片)



新华社记者 龙启云摄

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

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迅速地、深入地向前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直接投入了这场战斗。他们的斗争性最强，火力最猛，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毛泽东思想的阵线空前增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经被和将要被揪出来，置放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一巨大胜利的胜利。最近胡乔木的反对社会主义复辟的败露，《前线》《北京日报》竭力攻击包庇胡乔木和作为自己寻找退身之地的罪恶勾当的被揭露，就是这个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掀起了一股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黑风。在这股黑风中，身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的罗拓，利用他所窃取的要职，在首都的论坛上，展开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猖狂的进攻。他除了独资经营《燕山晚报》毒品商店以外，又结合吴晗和廖沫沙，合股开办了“三家村”毒品公司。罗拓把《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变成了这家股份公司的门市部，变成他们伙同阴谋推选的领导和这家股份公司的宣传机器。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层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对立。在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必须运用总路线的经纶，资产阶级也要把总路线反动的经纶。无产阶级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的矛盾，总是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开始，从理论、学术、文艺等精神形式的东西开始，而后才制造言论、阴谋夺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九六六年匈牙利反革命暴乱，也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搞了一个毒害非斯伯，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事，吸取消治主义。它妄想首先从无产阶级文化阵地上打开缺口，对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上去。

在邓拓看来，一九六一年前后的政治形势，又是知识分子的一个“早春天气”，社会主义大势必前好了，马克思主义不期而行了。由他们这一伙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市大吉了。

《燕山夜话》开张伊始，邓拓就打出了“欢迎‘杂家’”的招牌，呼朋引类，招兵买马。这篇文章，在提倡“要有广博知识”的名义下，对古代“兼通各派”的“杂家”，“旧时代知名学者”，推举备至；特别称赞“杂家”在今天不仅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大的“杂家”自命邓拓得意，他要大搞大小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家”，掌握“各种领导工作”，这是邓拓阴险的

什么是邓拓欢迎的“杂家”呢？“杂”者杂乎，鸟七兽八也，牛鬼蛇神也；杂家者，全世史也。全面反映社会史的多面手也”。毛泽东在题词说：“各个大学本门可以有許多專家，許多家，可是世界史專家呢，在現代，基本只有兩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家，资产阶级一家”。（《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记录》“讲话”）“兼博要”，兼“杂”名的“杂家”，在古代就不是超阶级的。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邓拓所欢迎的“杂家”，当然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一家，只能是反社会反社会主义的一家。邓拓欢迎“杂家”，就是阴谋策划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篡改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鼓动牛鬼蛇神赶快出笼。他公开号召，反社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首先占领文化阵地，在“思想界大社会主义”，进而霸占“各种领导工作”，全面实现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的：“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予以镇压，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由于这个指示，邓拓不但不能畅所欲言，他实际因此说：“许多青年人对不同性质好恶的批评，竟认为不恰当，甚至认为这是毒草，因此他们不敢批评，使作家的创作自由，也受着限制”。（《毛泽东评说》）邓拓所欢迎的牛鬼蛇神，不但不能畅所欲言，而且还要受到镇压，因此他首先提出对毒草的批判斗争，比作用堵塞的方法治水，“以致洪水越闹越大，民不聊生，后来再辟为泽国成为四凶之一，永死在泽国”。（《堵不如开导》）胆大包天的邓拓，你究竟想毒害谁呢？只许你们毒害，不许我们毒害，这就你们这伙恶霸的霸道！革命的人民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行事：见毒草就毒，见牛鬼蛇神就打。决不容许你们的污秽污水随意自由泛滥。

邓拓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希望，特别寄托在延安的“清官”、反上的“傲士”等赞成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身上，极力攻击他们“自作主人，不当奴才”的“骨相”。他一再推明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林东光，十分欣赏他们在“政治上”的抱负。号召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结成党派的“林东光”，莫衷“书生议论”，而要“关心政治”，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那怕“头屑掉进血淋淋”，也要“力争权利不致转移”。这里，发端于老鸹、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的“怨士”——邓拓，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的真相。

邓拓既然是发泄发泄自己的怨气，说说而已吗？不，绝对不是。在邓拓那里，是“敢说敢干”“言行一致”的。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还组织了“三家村”黑店，经常夺取了北京市委的报刊。他已经交来交朋友，组织黑社会俱乐部。他阴险地通过一支大笔，召来上流社会之来者做他的“业余创作”队伍。他通过种种关系，同《海国图志》、《海寰图志》、《谢树彬》、《李慧娘》等毒草，同学生、教员、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败类联系在一起。使人感觉到上流社会，“村”旁有“村”，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三家俱有！要而言之，邓拓一伙，不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者，而且是结党营私、阴谋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者。“直来直去”对他们是不适用的。

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似乎令人莫解，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打着“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狼毒地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支暗箭。他们旁敲侧击，指桑骂槐，颂古非今，借古喻今，采用各式各样隐晦曲折的咒语、黑话，攻击辱骂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邓拓作为“三家村”的一个头目，竭尽全力施展了他的“博学”和“才华”。

在“三家村”的开场锣鼓《说大话的夸里》，在《专治“健忘症”》、《一个鸡鸣的段子》、《伟大的空话》、《两则外国笑话》等一阵一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紧锣密鼓下，邓拓一再反对“说空话”“吹牛皮”，“言过其实”，“夸大非非”，“空想”，“夸大其词”的一个中心，极其刺骨地批评这些脏水泼在党的领导身上，把它说成是：“真到如此，这种吹牛皮的人，随时随地都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得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吹牛皮则一”（《两则外国笑话》）“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多少。如果你随时随地留心，到处都可以发现。”（《伟大的空话》）他极尽恶毒、丑恶之能事，把党的领导，毛泽东时代的新人，刻画成一副丑态。

恶的形象：一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擅长说空话，专爱吹牛皮；而说过之后，又很快忘记，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样的人，却偏偏喜怒无常，春脉太过，容易发火，咋咋呼呼，主观武断，一意孤行，横行霸道……。总之，一切人间的恶德污行，几乎样样俱全，简直是罪不容诛了。

是什么引起邓拓如此刻骨的仇恨呢？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

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他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震慑着一切旧世界的势力，动摇了他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殿堂，宣告了他赖以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九五八年六月，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中国人民进一步摆脱了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强加的精神负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誓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闹一场。毛泽东同志说：“从来没有看见过人民大众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过去过那样富裕幸福？没有，他们做了三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国土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创造这块地方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现代修正主义者，对“大跃进”运动大肆污蔑攻击，说：“这是‘浮夸风’”，“是‘共产风’”，“是‘左倾冒险狂热的表现’”。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们惊呼：邓拓也会步陶铸他们的后尘“说空话”，“吹牛皮”，“是‘春雷过大’”，“心血上冲”，“血气上逆”，“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乔治·迪卡斯日记》）

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我们的劳动人民，革命斗争空前高涨，劳动热情大大发扬，决心要我国向“一穷二白”的帽子，一定要用勤劳的双手，在国内的国土上，写下新事业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国内外阶级敌人则害怕这是“强盗劳动”，“收奴隶制”，使人丧失自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声附和，说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是有“失大于得”，却把和自己一鼻孔出气，跟这些家伙一伙恶毒的党不赞成爱情力，封建势力和将相相联合！他说：“劳动力的发展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要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纪年早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个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当更清楚地懂得这个道理。”（《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帝国主义的，现代修正主义的，讥笑我们的大跃进”“主要是纸面上的东西”，是“假大跃进”，是“漂渺的口号和令人自眩的空洞计划”。国家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反对，大跃进和人公社“缺乏客观物质基础，并不是客观必然的产物，而是只靠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是思想起头起来的。”邓拓则讽刺我们的大跃进、人公社，是“想拍来的”“一个鸡蛋的党”去“放大”，恶毒地咒骂我们党定的建设计划，“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说，每一步都基于一个假说的假说为前提。对于一年以后的事情，他按着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更主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迫使他只好发展的目的。”（《一个鸡蛋的党》）他还把人民公社说成，取富好比较，影响我们党当中还不如蒋介石好”“唯唯此计不恰当”，“不知一什而促”，使得“饥饿而不知”（《略谈与邓拓》，结果，再得出“一个鸡蛋的党”也“全部破产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破产了”。所以：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人民公社，决不是你们几句巧言所能产生的了。狂吠吠，狂吠，不改其狂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大就的伟大的事实面前，在辛勤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工人农民群众大声的声讨声中，完蛋的不独别人，正是你们这些坏家伙。

邓拓还猛烈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党行“不顾问一切，依仗专政，横暴霸道，顺从民意，巧取豪夺”的群众运动。他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强迫命令，是“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他摆出自上而下的强制训令说：“即使在党内，邓拓也常常要比群众好得多”，要我们党向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学习，改变“邓拓”而实行“封建”，“一个按当时通行的人情和道德标准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法律制度”（《王道和霸道》）。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取消，大跃进应该停顿了，人民公社应立即解散，一个按照过去“通行”的方道理：“复辟的”“单干”，“土自一包”这也就是邓拓的“王道”。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广大劳动人民愤怒痛恨：“人民公社是专政，通向天堂之路”，邓拓则使我们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时候困难，恶毒地咒骂了瞎子摸人“手摸上”，“抓住瞎子”不放手。放他。劝我们不要抓住手上红脸的“桥樑”“不肯放手”，“不要害怕，放下就是实地。”（《放下即实地》）这个实地，也就是邓拓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的“王道”“乐土”。

邓对反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最后都集中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上去。正如同奇闻在庆祝党的七十大会上，周的大会上，周号召我们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情，邓则立即表示反对，把“马思”当作“左派工具”。他挖空心思地找到代表刘少奇氏父子在会上的语录道：“苏大难，吃牛肉，苏文生，吃菜羹。”他说：“历代许多有一些人相信‘马思’，这种人在以往往往很不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不喜欢‘马思’，就往住想不得开。”他极其恶毒地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八股，把全国人民的马思诬蔑为八股为“崇马思”；由此得出结论：“假若不幸而遇到马思，不管它是否真的还旧，也一定不敢吃可以吃的肉，对它也只能吃菜羹的汤，有觉悟的人也就下不了牛肉，而只能吃菜羹。”（《不吃牛肉吃菜羹》）邓坏就是这样用这种黑话，猖狂地号召人们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毛主席说什么，邓拓就反对什么。毛主席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名著论断。邓拓便假借几句小孩子的诗——“东风是我们的敌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攻击说，这是“伟大的空话”，这是“陈词滥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叫嚷，“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听了觉得还不够，不解气，他喊道：“把这种话叫做‘伟大的’并不确切，还是它叫做‘伟大的空话’更恰当一些”（《八大的空话》）。

毛主席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说：“诗当然应该以新诗为正宗。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宣传于当前，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学诗。”邓拓却说：“人们往往认为，旧的诗词或词调，徒具形式，与内容不称，而自谓诗人老手，很不容易由，要发展创作，决不能走这条路子。现在看来，这些道理也有见得对”（《创作新诗话》）。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主席又说：“一定要好诗，这才有起点的意见”（《不要求作诗》）。“诗是生活的反映”，“诗人的主要任务在于观察生活，读得烂熟，想得透彻”（《怎样写诗》），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毛主席说：“与斗争，与斗争，与斗争，其乐无穷！”（《卜算子·咏梅》），“诗人的主要任务，在于观察生活，读得烂熟，想得透彻”（《怎样写诗》），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毛主席说：“诗是生活的反映”，“诗人的主要任务在于观察生活，读得烂熟，想得透彻”（《怎样写诗》），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

乎古人把狗看得比猪更重要”，“在食用肉类中，狗肉的营养价值很高”，“狗屎能治诸病”（《谈谈笑话》）。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新中国妇女的革命斗争精神：“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邓拓却穷极无聊地赞扬“长发的奇迹”，大谈其长发美人，以及堕云髻、洗发髻等发式（《长发的奇迹》）。等等，等等。这类例子，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俯拾皆

从这里我们看到，邓拓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的。

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都反对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何以赠罪？首先就是骂、骂、骂。

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通篇就是骂、骂、骂。他借亡国海瑞之口，恶毒地咒骂党中央和毛主席，什么“政治腐败到极点”，什么“家家户户穷得干干净净”，什么“你的错误太多”，“……倾盆大雨地浇了下来。吴晗借借“骂”的手段，号召人们学习“骂皇帝”，而且“骂得痛快之痛快”的海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是在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昭助威。

邓拓也提倡骂。不过，掌权的则要比伙计的功夫见深一点，他不是“非常之痛快”地骂你一顿，而且硬要骂到你“狗血喷头”，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地骂你下去。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他把我们亲爱的党，恶毒地比做一个“自食其言”，“言而无信”，“欺蒙良懦”，“不信任”，“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发疯为狂”的“健忘病者”。病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积极治疗的方法”吗？有的。邓拓为“党”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骂他。他说：“在发疯的时候，马上用一盆开水，从病人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多少回交替着，一次不行，就连续三次。”你看，一副多么猖狂，多么恶毒的面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在骂。他说到这里，毛到东边想，采取一切旁的手法，使尽一切心机最毒恶的字眼，从笔底思想、政治的、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三民主义、四化等等一切，直到阶级斗争、资产阶级反动文攻武卫、儿童教育等。等等，无不成为对毛嘲骂的武器。在历次机会也会对毛，即在文革最为极端的祸殃的文字考证里，他也做过有过的对于毛的考证和咒骂。例如，在《“铸”字一文》，邓拓着重于考证北京西直门内大街的一家饭馆“铸肉铺”的“铸”字的含义，特意引了《诗经·大雅》中攻击周厉王的一首诗：“天之所将，无不胜也。夫谁谓，小子既。”直接攻击毛，利用迷信，多端嫁祸，不可数载。“这首诗的大意是：历史实行着安排，铸人罪人，大人们不应该用暗喻暗喻的谰言去奉承他。但我友情又宽大地给他指出批评，你们却小视小孩的做慢不能对待他们。你们不要以为我提出来，说不上什么，因此把我告戒你们的值得珍惜的事物当作儿戏。如果你们不批评我，继续放任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那就不可数载了。据我所见，邓拓在这里还是假借考“铸”字之名，借古讽今，咒骂三面红旗把人民置于水深火热之中，咒骂中央已经“不可救药”了。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千方百计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护的《前传》《北京日报》编辑组，在他们编的《燕山夜话》竟充塞了将近一半”的材料中，竟把这样荒唐离奇的东西作为“事实”，来证明“邓拓在政治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徒”的标题下，让它在飘飘荡荡之下，究竟为什么有什么？这不是把你们斥责所批判、等等等的欺瞒手法一下子暴露出来了么？”

在邓拓看来，我们敬爱的党中央已经不可能采取苛酷的手段了，用了费解拘捕法的手段，还不如说以“积极治疗”的目的，于是他又写了一种叫“科学根据”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打棍子。他说：“现代西医药的治病，是在有毛病的时候，用一根棍子来打，击打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这完全是胡说！西医大夫没有用“打棍子”的治疗方法“能记住”的。实际上，邓拓在这里根本不是在讲什么医学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对我们党的“政治疗法”，这就是用棍子反革命革命。革命非暴力推行，他们假借医疗的名义是通过逼供线，直接利用暴力推翻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复辟资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共和国，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强迫自己也不得不说：“这种方法——棍子也不得不采用。”“不敢采用”？岂不等于不得采用。当这反

《北京晚报》反对革命的

晓 白

《北京晚报》是邓拓伙同党向人民进攻的《燕山反党》主要阵地，是邓拓伙一次在反社会主义的御用工具。它在北京以至全国造成了大量毒气，散布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早就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愤怒声讨。

这些年，我由于经常给中央档案馆整理大量的文物档案，深深感到《北京晚报》的编辑们是按胡绳同志的指示来工作的。这不但在整理文物档案，这有时也是装门面而已。我们整理文物的条件很艰苦，领导指示是“文物档案的鲜明性，突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鲜明性，注重革命传统教育的作用性，注意北京党的历史事件性”。而《北京晚报》的故事家们首先注意到的—故事家们，就是要求去迎合他们的“邓老康”的口味。

我曾写了一篇《血染的发芽》的稿件，记述一个贫农姑娘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剪去了自己的发辫，以表达她革命到底的决心，后来她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反社会主义分子觉得“和平演变”的阴谋不能得逞的时候，或者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不“一般”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走上街头，煽动群众拿起武器，公开地实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这一伙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千万不可轻视这些不拿枪的敌人，他们的笔有时比反革命的黑枪还要厉害，而且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拿起枪来的。

吴晗有一“骂”一“罢”，邓拓也有一“骂”一“罢”。邓拓不仅在“骂”上比吴晗功夫更深，而且在“罢”上也比吴晗走得更远。真不愧为他们“三家村”黑店的大老板。

当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全国受到批判之后，邓拓居然出言表白说：“我一直没有看过这出戏”，好像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这是撒谎！这是明目张胆地欺骗人民！《海瑞罢官》演出后被罢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所谓“新历史剧”，实际上是“三家村”黑店的集体创作：吴晗在前台演出，邓拓幕后导演，还有廖沫沙等一伙人在台下“推椅顿足”，大捧其臭，他们的同演出了，蒋介石在台北听他的广播。

他“失去政治方向”，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叛徒”，“丧失民族气节”，从叛徒口中扒出了一个“要害”，“要害”的历史故事，写成历史论文、历史小说和两部电影，大量地传播到市到社会上。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三年中，吴晗出了《海瑞罢官》、《屠宫罢官》、《李善长罢官》、《廉颇罢官》。几乎在同时，邓拓也连续发表了“邓拓批评李”、“李师爷罢官”、“米奇别罢官”、“李三不替李道歉”、“苏东坡被罢官”等等。他们这些文章都成为反党分子的要害，趣味地探讨这些；他们笔下的要害了“李善长”，而散发了其他真相！何为“为政清静，关心民间疾苦”？何为“李善长”？何为“李善长”？何为“李善长”？等等。完全就是现实历史生活中有机关会党分子以这些文章为他的气提起来的。邓拓写的“罢官”，不仅同吴晗有异，而且同吴晗有异，而且加霜雪为被罢官了官的机关会党分子“辩护”，为他们的“翻案”，他们还写“理论文章”，的叫做要“为‘罢官’作‘重审评价’”。他们还把邓拓的“口”，向党发了“抗议”的呼声：“难道王公丞相出来，不许可吃一两两？”这种情感，他们问：“什么人觉得可笑？其中包含多少仇恨！据吴晗说，这个材料，原来和这个党派的叛徒，高占两书、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他们新迁到北京市委的领导位置上了。他叛变的情，自然和被罢官了官的机关会党分子发生共鸣，一齐翻在党中央的身上。

邓拓不仅同疾病较劲，大做“罢官”文章，为各级领导上分子提供案例，而且他还继续写作，另写了一种“罢官”，要各级领导者的党魁去白一方面，他和另属一起大声叫：你们不要该的好官罢了，真是岂有此理！另一面，邓拓进一而进：必须要求那些坏官员们又平，更要有好官！他的结论是：必须要求那些坏官员“伟大的空话”，而又“自食其言和食而无言”的人，让他完全休息的时候。我听说邓拓说伟大的空话和朋友们，……需要完全休息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而“伟大的空话”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毛病。……“《论“伟大的空话”》休息以后怎么样？办法说没有可说，邓拓还提供一个“高明医师”的样子，为病人开了两剂“特效”药方。药方我们不必细说，值得玩味的是附在药方后的一段话：“这两个药方，对于决定休息是否完全适用，需要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才要自己决定休息，凡是健康病人，切不可不加干涉。”（同上）言下之意，一切得听医师和“高明”的医师任意指挥，那就是要服从“健康医生”的官。他们这些“高明医师”篡夺领导，取而代之。这正是邓拓比他们这些“高明”之处。

好手啊。一九二九年，党中令全党全开，牛鬼蛇神统统不好听。邓拓看形势不妙，准备后路逃。他写出《海燕》这首词的最后一段（三十六行），准备“瞒天过海”，“走为上计”。反动派、顽固派的邓拓，是“不走不行，不走不行，临上”还放了一个《马前炮》，要“放敌于万劫之前”，这是白话作诗！用毛泽东思想总结起来的我们党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马前炮”也好，“马后炮”也好，都是无能为力作用的。想想谁？又有什么便宜呢？

邓拓，你《两则内乱外患》里不是说过吗：“山崖在牛皮破以前，只不过悬崖危地飞了。当然是侥幸幸运的；应该感到：另外的危险，牛皮底已破裂，要塌的人因不决意会决意走的不幸的人，恰恰落在牛皮底破裂以后。”

不错，人，恰恰落在牛皮底已经和将要“三折”以及所有不幸的革命的或反社会主义的同伙。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这几年来，只有极少数机会分子同你们这些“牛皮底已破裂”，“悬崖危地飞”是不行的。革命人民“决不轻易相信走牛皮底的”——不看清你们飞行的反动影响，不铲除一切牛鬼蛇神，我们才不救。

《北京晚报》的味儿不对劲。

因此，我曾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向《北京晚报》指出他们刊登稿件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反毛泽东思想，贬低解放军，歪曲革命历史。但是，

过了一年，我写出了这首，又寄给《解放军报》。这首也很快就被刊出了。原来《解放军报》不登这种诗，并不什么“诗知如此好”，真正因是这首诗是宣传军事的，然使《北京晚报》受不了。北京晚报的所谓是象郑国栋那样的什么“春风吹茅，雨破泥瓦”的“黑天狗”，以及什“风雨、雨、读书”之类

产粮食。

李军在邓颖超的小那厘店前站下，他问：“那厘店有传家宝吗？工农和革命传统的吗？”

我们斗争李军和他的随从，想在他的随从的随地上夺一夺地，是何等地不易啊！但是，他们被赶了出来，趁他们挖大洞，也要得面目全非、毁灭为了。如果他们要问我们何以如此大加反对，他们会说：“实际上，地。”

“叛变革命”

实际上，我们要我们工农兵和革命传统，我们不要我们叛变之的毒草！我们那几根毒草。

这些毒草，我们感到利

士们大加去它们的“黑话”，那不是我不要成了他们的“三家村”的良民了？

我们正是告诉《北京晚报》，我们正是告诉《北京晚报》，要清算其黑话。这是远远不够的！听其说其见行其，我们必须首先把黑店的日本文出来，把“三家村”掌柜的叛变文出来，把他们的黑账翻出来，把一切不得人的黑账翻出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幕完全打开。

我们工农兵群众一定要打倒“三家村”，一定要穷困《北京晚报》和《前报》（北京

阮元

每一个想了解真理的人都应该读毛泽东主席的书

在谈到当前国际形势时，姆林达谴责了苏共新领导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越南问题上搞所谓

阿里·姆达霍马·姆林达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在非洲进行的阴谋和颠覆活动，表示极大愤慨。他说：“帝国主义的债一定要还，我们非洲人民是一定要它还的。”

入人心。图为桑给巴尔青年在选购毛主席著作。

新华社科伦坡十七日电 毛泽东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和《反对自由主义》的泰米尔文版已经在这里发行。毛主席的这两篇著作由科伦坡人民出版社出版，译者是库马拉林加姆。

民对兄弟的中国人
的伟大成就感到无
限的自豪和正在进
行抗
，以解放南方、保
固和平而保护祖国
是一个巨大的鼓
励。

民再一次表示完全
民共和国对核武器
的的根本立场，并

把这个立场看作是保卫中国
的安全和世界和平的正确
途径。

请你向解放军指战员、科
学家、工程师、科学技术干部
和中国工人转达最亲切的祝
贺。

越南祖国战线中央委员会
主席团主席 孙德胜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日于河内

然而中国政府今天应当忘记：中国保使用核武器，而美出这样的保证。



快吓什

人的弹头没啦，还照吧，否则连这一

美帝对中国的战争挑衅只能加速彻底失败

评论说，美帝国主义冒险要同强大的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为敌，必将更加迅速地走向灭亡。

到險位
摩。索

见抱着她的儿子面。新

苦，不怕在
回医疗：不局



中国铁路老
小，一直在工
在给尼泊尔

新华社

各国舆论欢呼中国核武器加强了世界革命力量

对新华社记者说：“中国核试验爆炸成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伟大胜利。中国核力量的加强，加强了世界的革命力量。”

也门总司令第一助理艾哈迈德·阿兰西说：“中国的前进和进步就是我们的胜利。我们祝中国永远前进。”

第三次核试验成功。

社论说：“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当代人类最可贵、最革命的偶像——中国人民的

人类最可靠、最牢靠的堡垒——中国人民的
(核)试验成功,使为反对帝国主义、现代
修正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而英勇斗争的各国
人民感到欢欣鼓舞。”

杜论指出，帝国主义不再能用核武器讹诈和镇压没有武装的人民和苏联修正主义不再能为它拥有核武器吹嘘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为世界的阶级兄弟服务

中国医疗队，为了外国人民的健康，受祖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重托，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越过万水千山，来到各友好国家。中国医生牢牢记住毛主席的教导，立志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医生，他们日日夜夜为各国劳动人民奔忙。他们既是大夫，也当护士，他们对病人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受到外国广大人民的热烈赞扬。

两位阿尔及利亚老太太，原来都已双目失明，经过在阿尔及利亚西部玛斯卡拉城工作的中国医生的医治，都重见了光明，她们极度兴奋地向中国女医生拍手欢呼。

新华社记者 孙星文摄

本报综合报道 据新华社讯：各国公众舆论继续欢呼中国第三次核试验成功，强调中国在发展核

